



比较政治学

Comparative Politics

第2版

——变化世界中的 国家和理论

Nations and Theories in
a Changing World

〔美〕 劳伦斯·迈耶 著
约翰·伯内特
苏珊·奥格登

华夏出版社

Prentice-Hall

Comparative
Politics
Comparative
Politics
Comparative
Politics

比较政治学

Comparative Politics

第2版

Lawrence C. Mayer

[美]

John H. Burnett

著

Suzanne Ogden

罗飞 张丽梅

胡泳浩 冯涛

译

——变化世界中的 国家和理论

Nations and Theories in
a Changing World



华夏出版社
Prentice-Hall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比较政治学:变化世界中的国家和理论/(美)迈耶,(美)伯内特,(美)奥格登著;
罗飞等译. -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5

(21世纪高校教材译丛·政治学与行政管理学/赵宝煦主编)

书名原文: *Comparative Politics: Nations and Theories in a Changing World*

ISBN 7-5080-2440-0

I. 比… II. ①迈… ②伯… ③奥… ④罗… III. 比较政治学-教材 IV. D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38809 号

Comparative Politics, 2nd ed.

Copyright © 1996, 1993 by Prentice-Hall, Inc.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本书英文版为 Prentice-Hall, Inc. 于 1996 年出版。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专有出版权由 Prentice-Hall 授予华夏出版社, 版权为华夏出版社所有。未经出版者书面允许,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内容。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1999-3736 号

比较政治学:变化世界中的国家和理论

[美] 劳伦斯·迈耶 约翰·伯内特 苏珊·奥格登 著

罗 飞 张丽梅 胡泳浩 冯 涛 译

策 划: 刘 力 蔡 翔 赵洁平

责任编辑: 蔡 翔 李钊祥

封面设计: 张 朋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10002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先锋印刷厂

版 次: 2001 年 5 月第 1 版 200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30×988 16 开

印 张: 30.25

字 数: 462 千字

定 价: 48.00 元

比较政治学

总 序

政治学是社会科学中一门重要的基础科学。行政学是政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而行政管理则被认为是管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中国古代虽有丰富的政治学遗产，但是把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还是1900年左右近代西方政治学传入以后的事。据统计，从1901年至1904年之间，中国翻译出版西方政治学的专著就有66部之多。¹中国第一所开设政治学课程的学校，就是北京大学前身，1898年建立的京师大学堂。1903年，京师大学堂的课程表上所列8个科目，其中就有“政治学科”。辛亥革命后，相继建立的各高等院校，也大部建立了政治学系。至1948年全国解放前夕，根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全国约200所大学中，已有近50所大学设立了政治学系，培养政治学专业人才。而在许多政治学系的课程设置中，不仅有政治学理论、比较政治、国际政治、中国政治等政治学课程，也有行政学和操作性比较强的行政管理。在那一段时间里，中国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曾经取得了一定成绩，涌现出一批著名学者，出版了一批有价值的政治学与行政管理著作。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中国完成了夺取政权的革命任务，进入了巩固政权的建设时期。当时国家面临的问题，首先是如何建设一个稳定的、高效能的、真正是人民当

1134/13

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政权体制。按理说政治学际此时机,应该大有用武之地。然而众所周知,当时的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根据前苏联的高教体制的蓝本,于1952年取消了大学中的政治学系科。与此同时,政治学在新中国,也不再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而存在了。事隔近30年,直到结束“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改革开放之后,经过学术界几次酝酿,邓小平同志又于1979年发出:

“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²的号召。这样,上下结合,中国政治学才得以恢复。1980年12月,在中国政治学会成立(重建)大会上,当时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胡乔木同志在讲话中明确指出:“政治学是一门重要的科学,建国后取消政治学研究是错误的,在理论上、实践上都是损失。”“政治学不仅要研究政治制度,而且要研究国家、政党、人民和政治家及其相互关系。”他还强调说:“要研究人民通过什么途径来实现对国家的领导,如何在一切基层单位,即社会组织的任何一个细胞里,实现民三的政治生活,使每一个公民做为主人翁来行使自己的权利;……”³

从1980年到现在已经过去了20年。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研究在此期间的发展,无论是在培养人才方面,还是在研究理论解决实际问题方面,都取得了一定进步。但是相对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所要求的,显然还存在不少差距。

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研究在中国要想得到长足的发展,要想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当前还有许多方面的工作要做。下面仅就政治学研究工作方面,简单谈几点意见:

首先,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研究,要想得到社会认同,就必须能回答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提出的问题,提供解决当前中国现实政治与行政管理问题的最佳方案。为此,就要求中国的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研究工作者,能够立足于中国现实,深入下去,脚踏实地做大量艰苦的调查研究工作。要做认真的社会抽样调查,要定性分析,更要定量分析。要熟悉中国国情,再研究问题,才能弄清问题的症结所在。

其次,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研究要努力达到本身科学性的要

求。不能使科学性的要求屈从于一时的政治需要。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研究只能靠坚持自身的科学性来为现实服务。如果只知唯上、唯书，或者甘做轻气球，随风转，则它本身就变成了伪科学，用伪科学来服务于现实政治，不仅于事无补，而且会大帮倒忙。并且会严重败坏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研究的声誉。

最后一点，政治学研究，同任何其它学科一样，都不能固步自封。必须面向世界，敢于引进外国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研究的新理论、新方法，进行研究、验证，以便参考、借鉴。特别是在中国国内中断政治学研究的那三十年，正是西方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研究大发展的时期。根据国际政治科学协会(IPSA)的统计，⁴二战以后30年内，世界各国政治学的研究机构，增加了七倍；各国发表的政治学论文与报告，增加了三倍；各国专业政治学者也增加了三倍。这30年中，西方政治学者与行政管理学者都做出哪些成果，我们需要了解。我们要补这一课。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要敢于引进西方社会中那些行之有效又能为我所用的东西。然而这个问题，多年来，在中国社会科学的研究中，是个解不开的困结。认识上曾经多次反复。前几年，社会科学各学科都为译介西方学术理论著作而做过努力，但是却遭到一次又一次的诟病。其实马克思主义从产生时起，它就是开放的。作为科学理论，它从来不是封闭的。人所共知，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吸取了人类科学文化的优秀成果而产生的。它本身要发展，也就不可能拒绝从当代人类优秀的科学文化成果中吸取营养。那么，西方的学术著作，一切都是好的么？当然不是。它们之中也确实不乏牵强附会，甚至荒谬绝伦之作。但是它们总是少数，不能因为少数伪劣制品的存在，就拒绝与大量优秀成果接触。同时，我们应该相信人民群众，相信专家学者在他们所熟悉的专业范围内，对是非、美丑之间，具有正常的鉴别能力。

喜见华夏出版社出版《21世纪高校教材译丛·政治学与行政管理学》这一套丛书。其所选书目都是得到社会公认并被多所高校多次使用的教材。内容又比较新，囊括了许多新理论、新方法。有些虽然出版较早，但一再修订、再版。有的在近些年内出到六七版之多。这可进一步说明这些书在西方高校课堂上的“经

典性”。当然，在中国高等学校的政治学课堂上，主要应该使用中国学者自己编写的教材。但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使用中国自己编写的教材同时，再辅以这一套翻译教材，相信可以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趙宝煦

2000年2月7日于北京大学

【注 释】

1. 宝成关：《西方文化与中国社会：西学东渐史论》，吉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410-414页。
2.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0-181页。
3. 中国政治学会编：《政治学研究通讯》，1981年5月25日，试刊第3期。
4. 国际政治科学协会(IPSA)，是国际性的各国政治学家的联合组织，于1949年12月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支持下建立。该会每三年召开一次全体大会。2000年8月初将在加拿大魁北克市召开第18次大会。

中文版序

90 年代的美国比较政治研究

90 年代,美国的比较学者主要是继续考察政治体系、制度与公共政策,并继续抓住发展与民主的关系等问题;但是一个新的重点是经济发展和经济问题对随后政治体制发展的重要性。比较学者在 90 年代继续面临着使其模型和论说简单化的难题。许多比较学者放弃了他们早先雄心勃勃的努力即收集和處理关于很多国家的大量资料。这种方法已被证明是昂贵、困难,往往是收获不大的。部分原因是因为许多发展中国家不能提供充分或可靠的资料以进行有意义和有效的比较。在定量方法继续用于研究比较政治的同时,许多比较学者感到,从对单个国家的深入研究或对少量国家多种变项的研究中能够获得更丰富更深刻的理解。

90 年代也是在国际事务中发生了某些巨大变化的时期。美国比较学者不得不重新调整其研究的聚焦点以考察这些国际事件对国内政治体系、制度以及公共政策的影响。这些发展趋势和事件中最显著的问题是全球化、苏联解体和民族冲突。而这些又引发了一系列其他问题,在过去十年间引起了比较学者的注意。

全球化

首先是全球化或国际化。多个国家一体化成为规模更大的地区性架构,例如北美自由贸易区、欧盟和北约,已经影响了比较政治学研究。20世纪最后十年技术和通讯的迅速扩展也同样如此。处理这一系列由全球化带来的问题的需要使世界上一百八十多个国家在商业、经济、文化、货币和科学技术组织中走到了一起。通过这些功能性的国际和地区组织,它们已经制定了一系列规则和法律从而共同形成了国际“制度”(regime),各国不可避免地同意放弃一些主权以期获得或保护“集体物品”,例如自由贸易、健康的环境、安全和货币稳定。国际投资、旅游、移民和难民、大众传媒的全球化,以及每天三万多亿美元跨越国际的流动,不仅导致了更为复杂的政策问题是由政府来处理,而且也导致了个别国家主权的进一步侵蚀。

国际化意味着政府不能再自由地制定政策,就仿佛它们是孤立的国家单位,或者不用考虑其政策对国际体系中其他国家的影晌。许多国家的政策还不得不重塑其政治和经济制度以使其更符合有关功能性组织和国际制度的规则、规制和期望。其结果,90年代的比较学者开始把大量的注意力集中到国际化对国内政治制度,尤其是国内公共政策的影响。对中国来说,跟其他大多数国家一样,融入国际体系(例如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正促使政府改革其法律、政治和经济体制,并放松对其国内事务的某些主张。

苏联的解体

1989年在东欧各国以及随后苏联的解体为十五个独立国家,为比较学者提供了近乎实验室式的现场试验来研究大约二十多个国家的政治转型。这些国家基本上集中在世界上的同一个广大区域,在历史上的同一时刻面临国际体系相同的制约,并且是从相同

的共产党政权的制度框架下开始转型的。尽管这些国家的政治文化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苏联帝国迅速的解体给了 90 年代的比较学者以机会来克服各种障碍,进行真正的比较。

比较学者研究共产党政权的首要聚焦点是经济自由化与政治自由化之间的关系。经济自由化是否一定促进了政治自由化?使政治自由化先于经济自由化进行产生的影响是什么?比较学者同样感兴趣的是在预测共产党政权能否成功地建立民主方面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作为这些政权走向民主的长期、成功转型的第一步,稳定、法律体系的制度化和经济增长是否比政治权力更重要?最终,民主的建立是否可预测?由于东欧和前苏联的政权仍然处于变动不定的转型时期——的确,它们深为不稳定和无法建立起一个强有力市民社会所苦恼——比较学者尚未就民主化的成功模式得出结论。

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继续让比较学者着迷。迄今为止,它已力图推行了大量的经济自由化,与此同时没有搞同样大量的政治自由化。而且,与东欧和前苏联的政权相比较,中国人是从经济自由化而不是从政治自由化开始的。此外,不像前者在经济上搞“休克疗法”或政治上一夜之间从共产主义政治制度中转变出来,中国人选择了渐进主义。迄今为止的结果是中国遭受不稳定之苦较少,而又同时在多元化和民主化方面取得了进步。

中国的案例使比较学者难于形成关于经济自由化和民主化之间关系的强有力假设。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还引起了对统合主义(corporatism)和政治文化在民主化过程中作用的极大注意。统合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的和社会的统合主义)以及“亚洲模式”在经济发展和民主化中的作用在 90 年代的比较政治研究中地位显赫。

民族与宗教冲突

90 年代影响比较政治领域的第三个重大因素是民族暴力的爆发,它遍及整个世界,尤为突出的是在东欧和前苏联地区的国家、中东、非洲、南亚和印度尼西亚。日益增多的民族冲突使得比较

学者更密切地关注政治文化的组成因素,及其在形成一国制度和政策中的作用。它已引发了对冲突解决研究的更大兴趣。由于民族冲突经常导致要求自治、分离或成立国家——以及在暴力中搅乱别国——民族和宗教正在成为各国比较研究中更为突出的变项。

结论是,90年代的比较政治学研究变得更深刻地与国际趋势和事件相结合。国内政治事务现在较之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与国际事务缠绕在一起了,更受国际事务的影响。尽管比较政治学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完整性依然存在,我们“全球村”的比较学者现在必须比过去更要适应国际事务对国内政治和政策的意义等问题的研究。

美国波士顿东北大学政治学教授

苏珊·奥格登(Suzanne Ogden)

2001年3月

序 言

面对为“比较政治学”课程所著的新老教科书过剩的局面,期望在这一类著作中再写出一部言之有理的书,就成为一个难以应付的工作。尽管在构成本书主题的形势迅猛变化的情境下,体现内容的最新性已是一项可观的成就,但光是宣称这本书是最新的成果,尚不足以服人。一本新书将很快褪去它鲜亮的光泽。随着事实的展现,所谓最新成果的说法会很快过时,更新的书籍也将迅速被媒体抛弃。因此,面对着这样一个已相当拥挤的书市,在作出另写一本教科书的决定时,倒不如将写出具有某种独创性的著作来作为写作动机。

对我们来说,尽管现在对一系列政府的描述式知识有必要存在,但一本教科书应该要寻求它自己独特的地位,超越只是对这类资料的描述。我们期望在这本书中,不仅有对理论和具体国别的研究,还能将这两类资料联系起来,为政治世界中所充斥的迅猛变动提供有条理的研究视角。

“变动”本身就是个含糊的主题,除非对“变动”的内容予以明确说明。在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当我们致力于本书的第二版工作时,世界上出现了一些新的政治模式。在这段时期里,世界上最显著的一种变动就是出现了从权威政治向民主政治的普遍转变,苏联的解体就属此列。这个帝国的崩溃,使得第二种主要模式得以出现——民族或文化保卫的政治,或

者领土收复主义的政治至上现象的兴起,这类在1977年被当时的作者视为新生力量的现象,现在已在西方民主国家,并同样在欠发达的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国家中,改变了原来就特殊意义而言的分化和一般意义而言的政治的面貌。随之,在世界许多国家中出现的共同体或“国家”意识的丧失,以及共同体危机爆发对民族国家机构和运行带来的影响,在本书中都作了详细的探究。同时,我们还探讨了遍及世界的专家治国制的日益重要性,这种体制清楚地显现在诸如公共官僚政治统合主义等现象之中,这类现象导致许多工业化国家在政治过程性质上趋于一致,这种趋同可能会在那些提高技术水平的欠发达国家中扩展开来。

正是这种快速和深刻的变动,在给要求从中寻找出一定模式的任务以挑战和机遇时,赋予其比以往更为严峻的形势。正是通过对这些模式的洞察,才能确认在当代世界中发生的诸多事件的价值所在。因此,我们的工作就是基于这样的假设,即除非利用一些理论的框架来组织政治现象的原始材料,否则这些材料毫无意义可言。

但是,脱离资料建构起来的理论,只能算是一种在形而上层面上的运用。理论应能适用于实际的政治机构和事件。因此,我们将理论部分章节作为对国别研究的一个导论,然后充分运用和大量参照理论部分章节的内容,努力来建构后面的国别研究。本书在写作时,并未假定学生对理论著作或本书所涉及的外国政治及社会状况有任何预先的熟知。本书的出现,是为了满足学生要了解关于本国之外政府的、比零星消息更多的知识的希望和期待。书中理论性的和描述性的观点,将让学生既能从材料中获得乐趣,又能更为有效地保有它们。零星的材料很快就会忘记,而对于政治结构、过程和发展趋势的理解,在课后仍将经常停留在学生的记忆之中。

我们想要特意指出的是,在写作和编撰这本书时,我们把比较政治学领域内的各种不同观点都已纳入书中。因此,尽管我们力求使本书的不同部分之间能保持一致,但如果需要的话,我们通过写作和组织,使得每一章节也能够自成一体。这样的做法,使教师在确立所教课程的目标和内容时能更为灵活。一些教师会选择跳过理论建构的章节(第一、二、六和九章),而直接转向国别研究的章节。用这种方式,就可以对国别研究的章节分章阅读。特别是有一

些教师会明显感觉到,第一章中对方法论的思考并不属于通常应是大学生所学的内容。当然,考虑到当代比较分析被定义为一种研究方法,许多教师认为,比较的逻辑方法也应该成为比较政治学的核心课程中的一部分。我们所作的修正,同时接受了这两方面的观点。因此,我们觉得,本书在这方面的独特贡献,对于那些希望使用本书的人来说,应该有使用价值。

本书的主要作者劳伦斯·C. 迈耶和约翰·H. 伯内特,对于苏珊·奥格登在过去和这次修订有关中国的章节中所表现出的技艺和专业精神深表感激。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体系,不能忽视,没有中国部分,本书显然就不够完整。本书的主要作者在其余章节中,从一开始就努力合作互助。可以公正地说,贯穿本书的论点和结论都是我们共同得出和总结而成的。

在第二版中,除了新增的有关拉丁美洲的章节外,其余各章都作了重大的改写和更新,为的是使本书能与不断出现的事件同步,以及对过去所作结论和推论予以重新考虑。尽管许多新的变动被纳入书中,但我们感到在第一版中所作出的主要结论和概括,更为这之后世界上所发生的事件所强化而非削弱。

对于那些对本书作出认真的和富有建设性分析的评论家,我们深表谢意。我们已经仔细地考虑过他们的每一个建议,并将其中的相当一部分纳入书中。我们还要特别感谢得州科技大学的加里·埃尔伯,他在拉丁美洲部分的章节中的专业评点和指导,对写作这一章的准备工作起到了不可估量的帮助作用;还有同样来自得州科技大学的卡鲁·卡鲁第三先生,他贡献了关于他的祖国——尼日利亚部分的专业知识。当然,对于本书中存在的任何事实和判断上的错误,由我们承担全部责任。

对于普伦蒂斯-霍尔公司为实现本书再版所给予的鼓励和信任,本书作者深表感激。我们还要特别感谢始终对编辑工作予以指导的尼科尔·西格诺里蒂,以及新版的编辑迈克尔·比克斯塔夫。

劳伦斯·迈耶
约翰·伯内特
苏珊·奥格登